

谈谈武汉文化的软实力

樊星^{*1}

(武汉大学文学院, 湖北武汉 430072)

【摘要】 武汉再度崛起, 因此有必要研究武汉, 提升武汉的文化软实力。武汉素以“码头文化”为人所知, 但码头文化与革命历史的关系却少有研究。武汉的水文化、商业文化、文学传统与教育优势虽然经常为武汉的学者所论及, 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、宣传。本文试图通过对武汉文化综合实力的多角度回顾与研究, 为武汉文化研讨拓展思路。同时, 指出武汉文化的短板, 思考进一步提升武汉城市文化的影响力问题。

【关键词】 码头文化 水文化 商业文化 革命文化 文化与文学

我们生活在武汉。外地人谈到武汉, 常常想到的是“火炉”(因为武汉夏天的酷暑而得名), 或者“码头文化”(而这个词又常常使人想到挤、乱、脏, 还有“打码头”)。一谈到武汉人, 还会想到“九头鸟”这个说法(所谓“天上九头鸟, 地上湖北佬”)。“九头鸟”是什么意思? 给人的感觉是怪异。其实, 据学者研究: “‘九头鸟’的形象早就出现在《山海经》, 未经丑化, 保持着夷殷祖灵——太阳神鸟的重要特质。《大荒北经》有神名九凤, 它‘九首, 人面鸟身’。”既然是“神鸟”, 为何会转成“恶鸟”? 与种种迷信传说有关: “明明是太阳神鸟却强调其致旱; 仅仅是‘宵飞而夜伏’……就暗示它代表病亡或导致覆亡。”^{①②}

于是, 就有了这么一个话题: 我们该如何来认识, 又该怎么多角度认识武汉这座城市?

一、武汉的码头文化与革命文化

不错, 武汉文化是码头文化。就像天津文化也常常被称为“码头文化”一样。因为武汉是长江、汉水会合地, 过去南来北往商人常在这里做生意, 码头就多了起来。所以, 有“货到汉口活”一说。汉口在明代曾名列“四大名镇”, 与江西景德镇、广东佛山镇、河南朱仙镇齐名, 曾经无限风光。到近代, 晚清名臣张之洞督鄂, 在武汉大搞“洋务运动”, 建成芦汉铁路、汉阳铁厂、汉阳兵工厂、湖北自强学堂……使武汉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再度腾飞, 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相当可观的基础。武汉人永远记得张之洞。汉口的张公堤, 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, 为治理水患, 拨款修筑的后湖长堤。此堤为汉口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基础。武昌有一条“张之洞路”, 因为周边保留了张之洞兴建的实业、学堂、兵营等众多历史遗迹而得名。蛇山上的抱冰堂也是张之洞离鄂时他的门生、部下为纪念他所立的建筑, 因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, 取《吴越春秋》“冬常抱冰, 夏还握火”之意以自励, 故有斯名。汉阳月湖堤畔, 还有新建的“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”。此后不久,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, 一群湖北的普通革命党人首举义旗, 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头

¹ 作者简介: 樊星(1957—), 男,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。

基金项目: 湖北省教育厅 201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“湖北的文化软实力研究”(编号: 13zd003)。

² ①叶舒宪、萧兵、(韩)郑在书:《山海经的文化寻踪》(下), 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, 第 2160—2161 页。

功，令世人再次对湖北人刮目相看。到了“20 世纪初叶的 10 年间，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10%左右，常居全国第二位，‘驾乎津门，直逼沪上’”，于是有了“东方芝加哥”的美名。汉阳也一度因为制造业的发达而有过“东方曼彻斯特”的称号。这些都充分表明，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和都市版图上，武汉不可小看。

不可否认，“打码头”这个说法道出了武汉民风的一大特点。码头上竞争激烈，大家都想占地方做生意，拉拉扯扯、挤挤嚷嚷中，矛盾就层出不穷了。

武汉有一宝庆码头，很有名。宝庆，是湖南邵阳的古称。说到湖南人，也是民风强悍。他们来汉口码头做生意，与安徽人发生了矛盾冲突。双方经常扯皮打架，据说闹了百年。后来告到官府。官府的昏官决定，谁能穿上“红鞋”走三步，码头就归谁。“穿红鞋”是古代一酷刑，即把铁做成的靴子烧得通红，让犯人把脚伸进去作为惩罚。安徽人一看就不敢了，而宝庆一裁缝（一说剃头匠）得到死后宝庆乡亲们养他的老婆孩子的承诺后一冲动就“穿”了“红鞋”，没走几步就倒下去了。于是昏官断定这码头归宝庆人，从此就叫宝庆码头了。武汉籍作家邓一光曾根据这一传说写成一篇小说《窄街》。老作家刘富道在《汉口徽商》一书中也记录下这一民间历史的一幕^③。这样的传说是码头残酷斗争的一个缩影。不过，也有地方史专家认为，从“打码头”中可见在汉口谋生之不易，表现出武汉人性格中坚毅强悍的一面。此说也道出了“码头文化”的一言难尽。

渐渐地，在武汉码头上就形成了好勇斗狠的民风。然而，这民风在历史上也曾经发挥过改天换地的作用。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武昌？原因十分复杂。与张之洞在这里兴办学堂、新军有关，也与湖北人好冲动的民风有关。辛亥革命起事十分突然，是在革命党人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时，因为制造炸弹出了意外，清军大肆抓捕革命党人，迫使革命党人提前仓促起义。而那起义的契机，竟然是革命士兵与反动军官吵架，革命党人一抖狠就把革命的烈火给“抖”出来了。辛亥革命是武汉的光荣，普通士兵成为革命主体，火爆脾气就是导火线，而且一旦起义就爆发出强悍的冲击力，直至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。武汉人“敢为人先”，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特别突出。革命党人起事时不怕鬼、不信邪的精神足以令人想起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古语（武汉正在楚地！）。又过了十多年，在大革命的风云激荡中，武汉成为“收回英租界”、“二七大罢工”、“中共五大”、“八七会议”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，也显示出武汉“码头文化”的另一面来。关于辛亥革命，武汉作家罗时汉有《城市英雄》一书，谈那段历史风云的来龙去脉，值得一读。这样看来，武汉的码头文化与革命文化、红色文化也悠然相通。因为革命是暴动，革命需要冲动。

另一方面，码头上南来北往的物质流通、文化交流也拓展出眼界的开阔、凝聚出乡情的醇厚。老武汉的“黄陂会馆”、“黄陂街”、“湖南会馆”、“湘乡会馆”、“衡山会馆”、“宁波会馆”、“绍兴会馆”、“山陕会馆”、“江西会馆”、“徽州会馆”、“岭南会馆”、“川主宫”（四川会馆）……据统计有八十多家，可谓会馆林立，风光无限。武汉因此有“最具江湖气的城市”之名。也因此，才有了各路美食在此比美——从宁波的汤圆到湖南的米粉，从山西的刀削面到兰州拉面，从江浙的汤包到北方水饺……武汉小吃也渐渐因此名扬四海——热干面、精武鸭脖、周黑鸭……也因此，才有了各路戏班在此码头竞技——京剧、楚剧、汉剧、越剧、豫剧、杂技、说唱……上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，武汉曾有“戏码头”的美誉。当时国内政局相对稳定，经济快速发展，汉口码头云集各地商贾。浙商、徽商都在此投资、经营。汉口也成了“戏窝子”，各地的好戏、名角在此竞争，最热闹的剧院和最疯狂的票友在此狂欢。谭鑫培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周信芳等戏曲界名角都曾来汉“拜码头”。1936 年梅兰芳先生来汉，汉剧大师陈伯华与梅先生两家剧场同时上演《霸王别姬》，形成打擂之势。结果都爆满，引来一片赞誉之声，传为佳话。可见不是所有打码头的结果都那么残酷。在码头上竞争，你要想打出一片天地来，还必须要有率真的情感、过硬的本事、灵活的头脑，还得有一种感召力，其中就包含牺牲精神和敢于担当的义气。这是“码头文化”的另一面。

所以说，“码头文化”不应该只是贬义词，它是一个内涵很复杂的概念。码头上需要狠气，还需要义气，需要热情，需要邻里相

³ ①刘富道：《汉口徽商》，武汉：武汉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 74—76 页。

帮。这种敢于担当的义气，豪爽豁达的一面，值得武汉人自豪和传承。

二、武汉的水文化

武汉有“百湖之市”的称号，除了长江、汉水在此汇流，还有众多湖泊——东湖、南湖、西北湖、严西湖、后湖、沙湖、汤逊湖、墨水湖、还有东西湖……武汉有很多地名跟水有关，像六渡桥、积玉桥、花桥、三眼桥以前都曾经有桥。还有江汉路、江岸区、金银湖、三角湖、水果湖、晒湖、江夏、汉阳、野芷湖、紫阳湖、杨汊湖、杨春湖、黑泥湖、湖边坊、鄂城墩、堤角……这些地名让人一听就觉得武汉这城市水气充沛、湿淋淋的。还有那些俗语：水货（假货），撮虾子（赚小钱），起篓子（赚大钱），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（各有各的路子），划不来，过浆淌；黄鹤楼上看翻船（幸灾乐祸）；东西湖里吹喇叭（没有的事）……还有武汉的特产：藕汤、鱼丸、精武鸭脖、周黑鸭，等等，也都与水有关。正所谓：“靠水吃水”。

武汉由三镇组成，因此显得格局特别大。长江之大，也尽人皆知。汉水又是长江最大的支流。东湖比杭州西湖大六倍。因此有了武汉文化的一大特点：大气，能包容南来北往的文化。比如武汉人早点特别杂，五芳斋的元宵来自宁波，米粉又来自湖南，还有来自四川的担担面、山西的刀削面，还有本地特产热干面、面窝……可谓五花八门。从早餐的丰富就可看出武汉文化的包容性，这就是大气。娱乐方面，武汉老百姓喜欢楚剧、汉剧、湖北大鼓、湖北评书，也喜欢京剧、黄梅戏，再加上杂技、马戏，口味也相当杂。国际交往方面，1861年，汉口开埠，五国租界和十二国领事馆纷纷建立，与各地会馆遥遥相望，也是一大奇观。

武汉因此能包容天下各家的长处，一步步成就自己的辉煌。

说到水，孔子说过：“夫水者，遍予诸生而无为也，似德。其流也卑下，裾拘必循其理，似义。其洸洸乎不尽，似道。……其赴百仞之谷不惧，似勇。至量必平，似法。盈不求概，似正。绰约微达，似察。以出以入，以就鲜洁，似善化。其万折也必东，似志。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。”（《荀子·宥坐》）意思是：流水浩大，普遍地惠及万物，就像德；它流动起来向着低下的地方，弯弯曲曲一定遵循流动的规律，像义；源源不断，像道；奔赴百丈深谷也不怕，好像勇；注入量器时一定很平，好像法；无孔不入，好像洞察力；各种东西在水里洗涤过，便鲜美洁净，又好像善于教化。而它经历万千曲折也一定向东流去，又好像志气。所以君子看见大水一定要观赏。水里包含了种种美德，正所谓“上善若水”。

武汉文艺家一直在满腔热忱抒发天地正气方面笔耕不辍，因此产生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——从革命年代的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到新时期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祖慰的报告文学《快乐学院》、曾卓的诗歌《老水手的歌》、白桦的电影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、池莉的小说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》、田禾的诗歌《喊故乡》、沈虹光的话剧《同船过渡》……一直到夏雨田的相声《女队长》、《农老九翻身记》，都体现出武汉文艺热烈或者温馨的鲜明特色。这一切，连同古老的知音传说一起，都体现出“上善若水”的美德。

也是在武汉这片热土上，一直以来产生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道德模范人物——从1950年代著名劳动模范马学礼到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、朱九思、学雷锋标兵朱伯儒，到这些年涌现出的学雷锋标兵吴天祥、“信义兄弟”孙东林、孙水林，还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、“感动中国”人物桂希恩、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全国道德模范黄来女、华中师范大学创办救助贫困孩子的爱心组织“圣兵爱心社”的全国优秀高校辅导员冯圣兵……还有数不胜数的武汉好人，也都体现了助人为乐、“上善若水”的精神。显然，并非所有的码头都产生过如此集中的爱心传奇。

三、武汉的商业文化

武汉是个很重要的商埠。何祚欢先生曾经说，武汉文化与其说是码头文化，不如说是商业文化。大家在码头做生意，光抖狠不行。经商有经商的道德：诚信为本，童叟无欺，这是商业的基本理念。何祚欢的中篇小说《养命的儿子》，以他的前辈经商的波折为题材，写小商小贩在武汉经商的不易，并且引人思考：为什么养命的儿子总得不到好。他写《养命的儿子》，为武汉那些兢兢业业的小商小贩竖起一尊雕像。他还在长篇小说《舍命的儿子》中描写了汉口商人的种种规矩与世态：从“商场无父子”这样的冷酷信条到“一人为私，二人为公”的职业道德，从汉正街的小商贩蹲在素菜篮子旁边喝酒吃菜的艰苦作风到“在汉口做生意一味低头弯腰不一定就能和气生财，有时候该狠就发真火，有时候得发假火‘行诈’把对方压住”的心计与手段，都写出了商场的无情。还有“也许生意人只有在发迹之初才会真正实践‘和气生财’的信条，而一旦成事，就有点‘行大压客’了”的世态，以及“汉口这个地就是这样不容情地吞灭不经营退路的成功者”的感慨……读来足以使人想起“商场如战场”、“同行是冤家”、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、“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”这一类的俗语，亦可谓五味俱全，点点滴滴在心头。

武汉虽说是个商埠，可历来没出过大的商帮。这个现象值得研究。人们谈到中国的商帮，要么是组织严密的晋商（如乔家大院就是晋商的代表。山西作家成一的长篇小说《白银谷》，还有热播一时的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都写出了晋商的辉煌与不易），或者是能吃苦耐劳的徽商（台湾作家高阳的长篇小说《胡雪岩》就讲述了胡雪岩的人生浮沉）。后来随着沿海的逐渐发达，近代出了了不起的浙商（例如“宁波帮”，船王包玉刚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。还有“温州帮”，温州籍作家林斤澜的小说集《矮凳桥风情》就写出了温州人顶着政治压力经商的精神）。武汉一直在打造楚商，可值得研究的是，武汉人为什么生意做不大？有专家分析原因，认为一是武汉人“醒得早，起得迟”。很多点子想到后就是不肯下大气力做大，结果等到生意刚做起头，没很好发展就停滞不前了。武汉曾产生不少名噪一时的品牌，如长江音响、莺歌电视机、荷花洗衣机、行吟阁啤酒……可是后来都被沿海的品牌所取代，令人感到惋惜。二是武汉人似乎对小生意特别有兴趣，最有名的是曾经闻名海内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。可现在这个市场显然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风头超越了。楚商怎么做大做强？值得研究。

商业文化需要道德作为商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。做商人必须讲商业道德，除吃苦耐劳，起早贪黑外，还必须讲诚信，童叟无欺、公买公卖、不差秤……武汉的商业文化常常以小、更贴近市民而饮誉商界。被评为全国十大面之一的武汉热干面（蔡林记热干面），还有福庆和的米粉、四季美的汤包、老通城的豆皮、五芳斋的汤圆等等武汉知名早点，还有这些年兴起的精武鸭脖、周黑鸭，都是以小、以贴近市民口味为特色。贴近市民，把小处做好，也很可观。别人在做大的，我们就查漏补缺，把小的做好。一个汉正街，一个武汉早点，可以说充分体现武汉商业文化的这一特点吧。

然而，武汉也有过大的辉煌啊！从张之洞办汉阳铁厂、汉阳兵工厂到1950年代武汉建成长江大桥、办起武汉钢铁公司、武汉重型机床厂、武汉锅炉厂、武昌造船厂……武汉实业之大规模与武汉特产之小形制形成了有趣的对比。在改革开放深化、国际竞争激烈的形势下，一些老企业已经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，一些新的奇迹又在武汉崛起了——武汉光谷、武汉车城，还有高铁枢纽。武汉会在飞速发展的年代里再创佳绩！

四、武汉的文学传统与教育优势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给了多少文人创作的灵感！武汉早就有知音的美好传说，说的是春秋时期音乐家伯牙操琴，樵夫钟子期从他的琴声中听出了高山流水的韵律，二人因此成为知音。后来子期病故，伯牙竟然悲痛欲绝到摔琴并不复弹琴的地步！故事出自《列子·汤问》。至今汉阳有钟子期墓、琴断口等遗迹。现代化的琴台大剧院也为弘扬知音文化作证。后来，从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（崔颢：《黄鹤楼》）到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（李白：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），再到“把酒酹滔滔，心潮逐浪高”（毛泽东：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）、“万里长江横渡，极目楚天舒”（毛泽东：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）……武汉成为文化名城，与许多文人墨客在此流连，留下不朽作品有关。

现代武汉还有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异军突起，从曾卓、绿原、胡秋原、姚雪垠、徐迟、碧野到刘富道、白桦、祖慰、池莉、刘醒龙、邓一光、陈应松、董宏猷、田禾……他们的许多作品就写出了武汉的文化品位和武汉人的精气神。他们频频在全国获奖，也让人们对武汉刮目相看。池莉的小说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》把武汉人那种苦中作乐的品格写活了。还有她的中篇小说《不谈爱情》，写花楼街人的生活与心态，中篇小说《生活秀》写吉庆街的热闹与坚韧，也为武汉小吃——鸭脖子做了十分成功的广告。我们武汉人读过以后会觉得非常亲切。这就是武汉人：他和在皇城根下玩的北京人不一样，也与在十里洋场上冒险的上海人不同，他就是在天高皇帝远的长江边上尽量把小日子过得热热闹闹、快快活活。由于这些著名作家的影响，武汉喜爱阅读和写作的人们越来越多。

武汉的文化品牌还有高校。据统计，武汉高校在校学生数超过 120 万，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。为什么内地偏偏武汉有这么多高校？这得感谢张之洞在武汉办两湖书院、自强学堂，打下了基础。张之洞写有《劝学篇》，倡导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他靠儒家思想指导办“洋务”，说“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，人才之盛衰，其表在政，其里在学。”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，堪称高瞻远瞩。他因此才在办实业的同时兴办教育，为武汉成为中国高校重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武汉众多高校把八方精英吸引到此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武汉的文化品位，也为全国、为世界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。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，武汉光谷进一步提升了武汉的知名度，也与武汉的高校众多、其中不乏著名大学（如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、武汉理工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……）有关。关于张之洞，唐浩明有长篇小说《张之洞》，值得一读。而关于当代武汉大学生的生活，也已有喻杉的小说《女大学生宿舍》、祖慰的报告文学《快乐学院》这样有名的文学作品为人称道。

武汉作为文化名城，丰厚的文化资源足以改变人们对武汉的某些偏见。现在，打造读书之城、博物馆之城、艺术之城、设计创意之城、大学之城的武汉，也都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武汉的文化品牌、复兴大武汉。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，武汉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。近年来，武汉的许多节庆（从“国际渡江节”、“国际旅游节”到“武汉网球公开赛”、“武汉马拉松”……）都为武汉的繁荣增添了一个又一个亮点。

了解武汉不止有码头文化，还有丰富的水文化、商业文化、革命文化、市民文化，可以使我们对武汉这个城市有一种新的认识。这么多了不起的人物在这留下了传说与传奇，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提升武汉人的文化自豪感。

五、武汉文化存在的问题

任何文化，都难免有短板。余秋雨就在《上海人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上海人的丑陋性”，诸如“缺少皈依”、“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，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，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。”^④易中天也在《读城记》中论及北京人的特点时，有专节谈北京人的“官气与痞气”^⑤。

武汉文化亦然。易中天的《读城记》中有一章《武汉三镇》，就谈到过武汉人的“火气太大，喜欢骂人”，还有“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”^⑥。这些问题关系到市民素质，也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，一直有目共睹，却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。虽然，2015 年，经过四次申报（全国文明城市，每三年一次），武汉终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，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“天上九头鸟、地上湖北佬”的不佳印象，还需要时间。

在几次关于武汉文化的讨论会上，我注意到武汉的学者在谈及武汉文化时，也常常是批评的口吻居多。这当然无可厚非。比起

⁴ ①余秋雨：《文化苦旅》，上海：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158—160 页。

⁵ ②易中天：《读城记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112—122 页。

⁶ ③易中天：《读城记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333—365 页。

上海，武汉人的人文素质似乎的确略逊一筹。武汉人性子急，说话嗓门大，办事风风火火，给人“涵养”不够的感觉（这也许源于当年开埠时打码头的遗风？或者来自古老峻急的楚风？）；武汉人说话好带“码子”，常常自称“老子”，以至于“湖北的老子”声名远播；武汉人（当然是男人）在酷暑中习惯于光膀子，“打赤膊”（实在是因为武汉是有名的“火炉”）；武汉人边赶路边“过早”也成了有名的市景……武汉地处“九省通衢”，容易得南来北往的风气之先。武汉也有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，汉阳兵工厂、武汉钢铁公司、武汉重型机床厂、武汉锅炉厂、江岸车辆厂、武昌车辆厂……都曾经名重一时。武汉的企业家曾经引领风气之先，推出过莺歌电视机、长江音响、荷花牌洗衣机、一枝花洗衣粉、“汉派时装”，以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，然而到头来或一蹶不振，或风光难再。为什么有天时地利，“汉派商品”却少有驰名度？武汉商家在检讨问题的症结时常常提到一句话：“醒得早，起得迟”，意思是：武汉人精明，点子常常能够引领时尚，却缺少做大事业的恒心与韧性。甚至，当那精明表现得过于自私、斤斤计较、缺乏远见时，就势必伤及事业的健康发展。我就接触过不止一位曾经想在武汉发展的企业家，后来终于止步不前的原因，就与他们遭遇了“太精明”的谈判对手有关。虽然，1990年代以来武汉“光谷”、汉阳沌口“汽车城”的大放异彩也在证明着武汉的博大胸襟。

中国为什么有“浙商”、“闽商”、“徽商”、“晋商”，却没有“楚商”或者“汉商”？武汉地处“九省通衢”，有发展商业的天然优越条件，在明代就已经成为“四大名镇”之一，到清代更有“中华帝国的大商业中心”、“也是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”^⑦，却一直未能成就与“浙商”、“闽商”、“徽商”、“晋商”齐名的辉煌？武汉其实是出过商业巨子的。例如曾有“地皮大王”之称号的刘歆生（1857—1941）就在清末民初凭过人眼光和手段牟取暴利，成为汉口巨富，曾拥有地产近40平方公里，捐60万两白银修筑张公堤，打造“汉口特别模范区”，被誉为“大汉口之创造者”。1927年，历经战火的武汉三镇百业凋零，刘歆生一次捐出了1600万银元，用于市政建设和救济失业者、难民。据统计，他历年捐款总计达2400万银元，如按当时比价，折算成黄金达36吨^⑧。只是，可惜，他的事业没有形成长久的群体效应。

武汉尽管拥有众多的大学、百万在校大学生，可由于武汉“二线城市”的地位，在发展速度、经济收入等方面难以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这样的“一线城市”相比，所以，大学生、研究生毕业以后的择业首选，常常是“孔雀东南飞”。虽然，近年来，随着“一线城市”生存压力的迅速加重，随着武汉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，选择在武汉打拼的年轻人已经大大增多。

如何重新擦亮“大武汉”的名片？怎样让武汉重新赢得“东方芝加哥”的美誉？真值得好好研究。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，提升武汉城市建设整体形象，直至打造出驰名中外的经济品牌、文化品牌，都还有待各方官员、专家乃至广大市民的深入探讨、集思广益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武汉曾经着力打造“山水园林生态城”，“以城市绿化为切入点，加强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，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城市绿化、道路整治改造等一系列环境改造、优化工程。有关数据显示，2004年，武汉人均绿地、绿化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为8.83平方米、31.05%和36.03%，已超过国家园林城市的要求；城区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99.5%，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优良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67.5%，均居国内城市领先水平。”此后，又进一步提出了“文化五城”建设的发展战略：读书之城、博物馆之城、艺术之城、设计创意之城和大学之城。这一切的展开，提高了武汉的文化水平，使武汉在“码头文化”的基础上，建立起文化大武汉的高层建筑。然而，这一切要得到切实的落实和持续的发展，还有一段长路要走。

^⑦ ④引自〔美〕罗威廉：《汉口，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（1796—1889）》（中译本），江溶、鲁西奇译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27页。

^⑧ ①蒋太旭、罗京等：《近代武汉工商巨子刘歆生铜像揭幕，曾亲绘汉口规划》，《长江日报》2014年9月5日。